

汪辟疆 撰

汪辟疆

名家说——
“上古”学术萃编

说

近代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汪辟疆说近代诗/汪辟疆撰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1. 12

(名家说“上古”学术萃编)

ISBN 7-5325-2981-9

I. 汪... II. 汪... III. 诗歌-文学研究-中国-近代 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3394 号

名家说——“上古”学术萃编

汪辟疆说近代诗

汪辟疆 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0.25 插页 4 字数 220,000

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100

ISBN 7-5325-2981-9

K·355 定价: 15.00 元

诗史的发展与汪辟疆 的近代诗学成就(代序)

张宏生

汪国垣,字辟疆,又字笠云;号方湖,又号展庵。1887年11月3日出生于江西省彭泽县。1903年考入河南客籍高等学堂,毕业后,于1909年被保送北京京师大学堂,1912年毕业(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,所以,汪辟疆毕业时已是北大学生)。其后,曾短期任教于南昌省立二中,后于1922年任江西心远大学教授,兼文科主任,1925年,任教于北京女子大学。1928年改任第四中山大学之聘。其后,第四中山大学几经易名,先后有江苏大学、国立中央大学之称,直到1949年以后的南京大学,汪辟疆一直在这里任教,前后达38年。1966年3月12日病逝,享年79岁。

汪辟疆5岁即入塾,一生治学不辍,文史兼通,是举世公认的国学大师。其治诗学通古达今,特别对近代诗学兴趣浓厚,自青年至老年,一直用力甚深,成果尤为学界所称道。

所谓“近代”,汪辟疆沿史家通例,断自道咸以后。他认为,道咸之后,不仅社会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,诗学也同样如

此。据此他指出：“有清一代诗学，至道咸始极其变，至同光乃极其盛^①”。不过，事实上不少诗人的创作活动多延至宣统甚至民国，所以，这个时间概念，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提法。

汪辟疆关于近代诗的研究成果，主要集中在《近代诗派与地域》、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、《近代诗人小传稿》和《光宣以来诗坛旁记》等文中。《近代诗坛与地域》原是1934年为金陵大学中文系所作的学术演讲稿，发表于中央大学《文艺丛刊》第2卷第2期，1943年重新刊布于《中国学报》第1卷第1期，后又略加修订，发表在《南京大学学报》1962年第1期。前后跨越30年，而改动不多，可见是他一以贯之的观点。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写成于1919年，1925年连载于《甲寅》第1卷第5号至第9号，1934年至1935年连载于《青鹤》第3卷第2期至第7期。1940年代中叶修改而成的定本“文革”中被毁，现在通行本为程千帆师所整理。《近代诗人小传稿》和《光宣以来诗坛旁记》是为其拟议中的近代诗选所做的前期准备工作，开始于抗日战争以前，其后续有增订，但由于各种原因，诗选没有最后完成，不过这两篇文章材料丰富见解精深，仍有着独特的价值。

一、近代诗的价值

汪辟疆虽然没有写过现代意义上的诗史，但他心目中有着一部完整的诗史存在，却是毫无疑义的，尤其对清诗，有着非常细致的辨析。他把清诗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。第一期是康熙之间，虽然“才杰之士，各摅藻思”，但不过是“众制咸备，风

会杂陈”。陈子龙、顾炎武、陈恭尹、陈维崧、吴兆骞诸家，尚承明代前后七子的流风余韵。钱谦益和吴伟业稍稍振拔，也还有模仿之迹。后来王士禛号称一代宗主，海内宗奉，进境却只“植体大历，而略参宋贤”。此外，如朱彝尊、宋琬、查慎行等人，虽均为一时翹楚，自家面目仍然不够突出。第二期为乾嘉之间，堪称有清一代盛世，经史之学极为繁荣，但诗歌却萎靡不振。创作题材不外应制、游宴、祝贺、赠答、赋物、怀古、述征、题图等，缺乏深湛之思和回荡之妙，不过追求对仗工稳、声调铿锵、辞采华丽而已。从诗坛盟主沈德潜、袁枚，到一时名家赵翼、蒋士铨、张问陶等，在意境上都有欠缺。至于厉鹗、姚鼐、翁方纲、黎简诸人，虽然别有创造，但号召力不够，也未能形成大的气候。以上两个时期，在汪辟疆看来，尽管形成不少热点，也有不少流派，但由于缺少自家面目，因而也就不是真正的转移诗坛风会。清诗真正有成就、有独特面目，是在第三期，也就是近代。自来学者论清诗，往往重两头，轻中间，汪辟疆却进而认为较之近代诗，不仅乾嘉之诗无足道，即康熙之诗亦多有不及，这是非常独特的见解。

汪辟疆心目中的近代诗，在时间上延续有清五个朝代，即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和宣统，为时既长，因而也可分为道咸和同光(宣)两段。道咸年间，清朝由盛而衰，外有列强窥伺，内有朋党迭起，忧国忧民之士，往往着力于经世致用之学，发之于诗，风格自然发生变化，代表作家有龚自珍、魏源、陈沆、何绍基、曾国藩、郑珍等人。延至同光(宣)，国家局势不仅难追乾嘉，甚至不如道咸。所以，五十年间，诗人无论在朝在野，无论是显是达，发为歌咏，无不悯时伤乱，有文有质。同光体诗人如陈宝琛、张之洞、沈曾植、陈三立等是如此，外于同光体

的诗人如黄遵宪、康有为、樊增祥、易顺鼎、王闿运、章炳麟、李慈铭、俞樾等也是如此。

当然,诗歌的创作成就和政治环境有关,却又不能完全相等。道咸以后的诗人在诗境上的探索是多方面的。汪辟疆认为,不仅“清诗之有面目可识者,当在近代”,而且当时以学宋为主的诗人,更能以其独创性,越宋人而上之,尤其难能可贵。他在《近代诗派与地域》一文中指出,近代诗超越宋诗的成就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体现出来:

宋诗承三唐之后,力破余地,务为新巧,大家如东坡、临川,亦复时弄狡狴,以求属对之工,使事之巧。如“鸭绿鹅黄”、“青州从事”、“乌有先生”之伦,已肇其端。南宋诸贤,迭相祖述,益趋新巧。近代诸家,虽尝问途宋人,然使事但求雅切,属对只取浑成。其异一也。诗歌以蕴蓄为极致。……两宋诗家,力求意境之高,终鲜洄漩之致,才高体大,如坡公、山谷、放翁、诚斋,颇有讥其太放太尽之病。临川早年意气自许,诗语惟意所尚,不复更为涵蓄,晚年始造深婉不迫之境。则其他诸家伤于直率,更未能免。近代诗家虽尝学宋,然力惩刻露,有惘惘不甘之情,故调高而思深,言近而旨远。其异二也。晚唐诗家,极研声律,一篇之内,音节谐美。宋人病其啍缓,救以古调,专事拗捩,其运古入律者,往往古律不分。山谷、临川以力避谐熟之故,间为此体。末流所届,逮于余杭二赵、上饶二泉、江湖末派之伦,钩章棘句,至不可读,则力求生涩之过也。近代诸家,审音辨律,斟酌唐宋之间,具抑扬顿挫之能,有谐鬯不迫之趣,其异三也。……两宋诗家,承三

唐声律极盛之后,独出手眼,别开面貌,其精思健笔,洵足惊人。然尔时作者,惜多不学:荆公《字说》,腾笑千古;东坡经学,尤甚粗疏。宛陵但汲流于乐府,后山只丐馥于杜陵。新安泛滥六经百氏,然天纵馥事,时落理障;永嘉抗志内圣外王,然经籍镕液,终鲜变化。他如永嘉四灵、江湖末派,敝精力于五言,穷物态于七字,空疏婊陋,更无论矣。近代诗家,承乾嘉学术鼎盛之后,流风未泯,师承所在,学贵专门,偶出绪余,从事吟咏,莫不镕铸经史,贯穿百家。故淹通经学,则有巢经、默深;精研许书,则有馥、匹园;擅长史地,则有春海、寐叟;通达治理,则有湘乡、南皮;殚精簿录,则有即亭、东洲。其专为《骚》、《选》、盛唐,如湘绮、陶堂、白香、越縕、南海、余杭诸家,亦皆学术湛深,牢笼百氏,诗虽与宋殊途,要足与学相俪,则又两宋诸诗家所未逮也。

汪辟疆的这些看法在清末民初显得非常独特。事实上,当时学术界中不少人对有清一代诗的评价并不高。如文廷式在《闻尘偶记》中说:“国朝诗学凡数变,然发声清越,寄兴深微,且未逮元明,不论唐宋也。固由考据家变秀才为学究,亦由沈归愚以‘正宗’二字行其陋说,袁子才又以‘性灵’二字便其曲谈。风雅道衰,百有馀年。其间黄仲则、黎二樵尚近于诗,亦滔滔清浅。下此者乃繁词以贡媚,隶事以逞才,品概既卑,则文章日下。采风者不能不三叹息也^②。”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三十一也说:“以言夫诗,真可谓衰落已极。吴伟业之靡曼,王士禛之脆薄,号为开国宗匠。乾隆全盛时,所谓袁(枚)、蒋(士铨)、赵(翼)三大家者,臭腐殆不可向迹。诸经师

及诸古文家集中多亦有诗,则极拙劣之砌韵文耳。嘉道间,龚自珍、王昙、舒位号称新体,则粗犷浅薄。咸同后,竞宗宋诗,只益生硬,更无馀味。其稍客观者,反在生长僻壤之黎简、郑珍辈,而中原更无闻焉。……清代文艺美术,在中国文艺史、美术史上,价值极微^③。”汪辟疆不仅能够看到清诗的价值所在,而且进一步从具体层面入手,揭示近代诗的特色,反映了他的识力和见解,是对文学史研究的一大贡献,在此之前,文学史上从未有人对近代诗给予这么高的评价。考虑到汪辟疆与清末民初诗人多有交往,或许不无溢美之处。但他精熟诗艺,又带有史家眼光,终非泛泛之论。当然,他的某些观点也还可以进一步讨论。如他说宋人多不学,如果是指宋人治学不如清人精深,倒是事实;指宋人处理性情和学问在诗歌中的关系不如清人,也还恰当。但宋诗有别于唐诗的一个重要方面,就是宋人比唐人博学,因而也使得诗歌面貌发生了变化。因此,对清人来说宋人是寡学,可对唐人来说,则又可以说是博学了,似乎还应该做更细致的分疏。

二、近代诗派与地域

诗歌发展到近代号称极盛,其诗人之多,诗风之繁,构成之复杂,活动之丰富,有着鲜明的特点。汪辟疆从风格与地域的关系入手,勾勒出近代诗的整体风貌,不仅是对近代文学研究的重大贡献,而且使得整部文学史的面目也变得更为清楚起来。

汪辟疆把近代诗坛分为六派:第一是湖湘派,以王闿运为

领袖,提倡汉魏六朝诗,和宋诗派相抗衡。第二是闽赣派,即同光派,以陈宝琛、郑孝胥、陈衍、陈三立为领袖,宗尚杜甫、韩愈、苏轼、黄庭坚,兼及李白、王维、白居易、柳宗元、孟郊、梅尧臣、王安石、陈师道诸家,一时羽翼呼应者甚多,成为近代声势最大的一个流派。第三是河北派,以张之洞、张佩纶、柯劭忞为领袖,张祖继、王懿荣、李刚己、严修诸人为羽翼,推崇杜甫,出入韩愈、苏轼,虽然与闽赣派宗旨相近,但一为直溯杜甫,一为取径黄庭坚,又有不同。第四是江左(江浙)派,以俞樾、金和、李慈铭、冯煦为领袖,翁同龢、陈豪、顾云、朱铭盘、周家禄诸人为羽翼,取法唐人,宗风在钱起、刘长卿、温庭筠、李商隐之间。第五为岭南派,以朱次琦、康有为、黄遵宪、邱逢甲为领袖,谭宗浚、潘飞声、丁惠康、梁启超、麦孟华诸人为羽翼,或取法杜甫沉郁之境,或学习白居易讽谕之风,致力于社会变革,多以诗歌咏叹古今,指陈得失。第六为西蜀派,以刘光第、顾印愚、赵熙、王乃征为领袖,王秉恩、杨锐、宋育仁、傅增湘、邓榕诸人为羽翼,诗歌宗尚介于唐宋之间,追求绵远的情韵。这六派覆盖了中国近代诗歌创作的主要地区,也体现了近代诗歌的主要特色与成就。

汪辟疆学诗从江西诗派入,论诗也理所当然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。他对诗派的划分和表述,和他所接受的资源有密切的关系,其中有两部书(文章)应该特别提出来。

一是《江西诗社宗派图》。该图为南北宋之际吕本中所作,虽然原作失传,但在宋人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、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、王应麟《小学紺珠》和刘克庄《江西诗派小序》等书中都有记载,诸家或有出入,大致上总数在二十五、六人左右^④。吕本中作图的用意,据其自述:“元和以后至国朝,歌诗之作或

传者，多依效旧文，未尽所趣。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，抑扬反复，尽兼众体。而后学者同作并和，虽体制或异，要皆所传者一。予故录其名字，以遗来者^⑤。”对这份名单，晚宋刘克庄曾经表示异议，认为其中不尽是江西人：“派中如陈后山，彭城人；韩子苍，陵阳人；潘□（按当为邠）老，黄州人；夏均父、二林，蕲人；□（按当为晁）叔用、江子之，开封人；李商老，南康人；祖可，京口人。非皆江西人也^⑥。”其实稍前的杨万里已经有过一个解释，其《江西宗派诗序》有云：“江西宗派诗者，诗江西也，人非皆江西也。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？系之也。系之者何？以味不以形也^⑦。”刘克庄坚持狭义的地域观，倒显得有些拘谨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杨万里所提出的这一原则被汪辟疆接了过来。他所开列的近代地域和诗派的名单，除了确实占籍者之外，也不乏外籍人士，如讨论近代最有成就的闽赣诗派，所包举诸人，袁昶、沈曾植是浙江人，范当世是江苏人，陈曾寿是湖北人，放在一起讨论，就是由于宗趣相同的缘故。

二是《瀛奎律髓》。《瀛奎律髓》为宋元之际方回所著。方氏学问诗功俱佳，尤长于论诗，但由于生平出处大节有亏，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。在现代学术史上，汪辟疆可能是最早全面论述方回诗歌创作和学术成就的学者。1930年，他在中央大学任教时，曾慨叹古今典籍散佚甚多，与黄侃谈到方回：“季刚论诗笃守师说，不及萧《选》以下，故所作多邻鲍、谢。四十以后，涉览既多，悬鹄亦降。偶事吟咏，称心而言。心抚手追者，不仅开宝诸公，即宋之临川、坡公、金之遗山，元之道园，下及清人钱东涧、厉樊榭，亦复时时拟之。宋元诗论，在季刚晚年固未尝废弃也。乃知齿及《桐江》一集，宁非无故^⑧。”

方回的人品,见之于周密《癸辛杂识》,极为卑污^⑨,汪辟疆亦深表不齿,但论其学术文章,则予以高度评价:

其学私淑紫阳,又亟称真西山、魏鹤山两翁。治经以注疏为先,析理以宋五子为至。求掌故于《通典》,明治乱于《通鉴》。文则秦、汉、韩、柳以及欧、苏,诗则骚经、苏、李、建安、陶公以及李、杜、韦、柳、欧、梅、黄、陈,而又语以博约之要,参伍之方,皆趋向甚正。……平心而论,宋诗至乾淳以后,江湖一派风起云蒸,诗格卑靡,侪诸魔道。虚谷生际其间,远宗栗里,近法浣花,而又标举宛陵、山谷、后山、简斋、紫薇、二泉(赵蕃及韩淲父子)、二赵(赵汝谈、汝谿),力辟四灵、后村、江湖之学姚合、许浑一派,斥为亡国之音。力挽颓流,最诸古澹,则又未始非卓然自立者也^⑩。

至于论诗,方回则“尊杜甫为‘一祖’,黄庭坚、陈师道、陈与义为‘三宗’。又手定唐宋五七言律诗体曰《瀛奎律髓》,论诗之外,兼及遗闻旧事。元明而后,流传弗衰”。“迄于近代,则又以举世崇尚宋诗之故”,“有奉为枕中鸿秘者^⑪”。汪辟疆所说当时把《瀛奎律髓》奉为“枕中鸿秘”者,或许暗指陈衍,因为汪氏在《评方回〈桐江续集〉》一文中认为陈衍的生平著述都与方回相近,“三元”、“同光”之论也和方回“一祖三宗”说深有渊源。但汪辟疆虽然对方回和陈衍都有微辞,其本身取向是江西宗风,所以对《瀛奎律髓》褒多于贬,其论近代诗派,揭橥领袖、羽翼之说,显然和《瀛奎律髓》所标举的宗祖之说有一定的关系。

三、近代诗系的重构

晚清文学的重要特点之一,就是对其当代创作具有非常自觉的理论探讨意识。讨论近代诗学,陈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。他的《近代诗钞》和《石遗室诗话》以其对诗坛的了解和内行的评价,成为时人非常重视的诗学文献,也奠定了他诗坛领袖的地位。陈衍的某些诗歌理论,汪辟疆是赞同的,如陈氏《小草堂诗集序》论及清诗之变:“诗至晚清,同光以来,承道咸诸老薪向杜、韩为变《风》、变《雅》之后,益复变本加厉,言情感事,往往以突兀凌厉之笔,抒哀痛逼切之辞。甚且嘻笑怒骂,无所于恤。矫之者则为钩章棘句,僻涩聱牙,以至于志微噍杀,使读者悄然而不怡。然皆豪杰贤知之子乃能之,而非愚不肖者所及也。道咸以前则慑于文字之祸,吟咏所寄,大半模山范水,流连景光。即有感触,决不敢显然露其愤懣。间借咏物咏史,以附于比兴之体,盖先辈之矩矱类然也。自今日视之,则以为古处之衣冠而已^⑫。”这与汪辟疆对乾嘉诗坛的看法相同:“乾嘉之世,为有清一代全盛时期,经学小学,俱臻极盛,而诗歌不振。盖以时际升平,辞多愉悦,异时讽诵,了无人^⑬。”但是,汪辟疆对陈衍的诗论也常不以为然,特别是对其享有盛名的《近代诗钞》,认为选录太杂,而且其福建同乡的作品入选太多,不免阿私。所以,汪辟疆在发表自己有关近代诗的看法时,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批评陈衍的意思。这当然也不是无缘无故的。考虑到陈衍当时的诗坛领袖地位,如果汪辟疆对其理论有所解构的话,那就应该是出于建立自己近代诗

学理论体系的目的。

不妨以对王闳运的态度为例。王闳运较陈衍年辈为尊,是前一个时期的诗坛领袖。王氏提倡汉魏六朝诗,略谓:“宋齐游晏,藻绘山川,齐梁巧思,寓言闺闼,皆言情之作。情不可放,言不可肆,婉而多思,寓情于文,虽理不充,犹可讽诵。近代儒生,深讳绮靡,故风雅之道息焉^⑭。”这和陈衍的宗风取向显然不同。陈衍对王闳运的整体评价很低,曾批评说:“王湘绮除《湘军志》外,诗文皆无可取。诗除一二可备他日史乘资料外,余皆落套^⑮。”这个“套”,正是指王闳运对汉魏六朝诗的尊崇。以王闳运诗坛的成就和实际地位来说,当然不至于如陈衍所说的那么不堪。陈之所以这样反对王,一则因为王是宋诗派和同光体之间最大的诗家,要宣扬尊宋理论,必须予以清算;二则王的影响力不小,当时诗人或曾信奉其诗说,如陈三立^⑯;或坚持其理论,如陈锐,其诗坛地位不容低估。

陈衍曾经在写于1901年的《沈乙盦诗序》中,借追溯十几年前旧事,称赞沈曾植是“同光体之魁杰”^⑰。可是到了1912年,其《石遗室诗话》在《庸言杂志》上连载时,又开宗明义借郑孝胥之口,说沈曾植仅是“能为同光体”^⑱。钱仲联认为,这一细微差别,反映了陈衍心态的变化。沈曾植得名甚早,陈衍追叙旧话,推其为魁杰,应是挟沈以自重。而“到清亡前后,陈衍的名声已逐渐增高,他以闽中诗派作为‘同光体’的主体,隐然以自己与郑孝胥为魁杰,所以1912年发表《石遗室诗话》时,沈的‘同光体之魁杰’的资格,轻轻地改换成‘能为同光体’了。这一变换,说明了‘同光体’在民初,几乎成为闽派诗的代称的原因^⑲。”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陈衍的这种变化所体现的文学观念问题。

1899年,陈衍客居武昌时和沈曾植论诗,提出了“三元”的见解:“余谓诗莫盛于三元:上元开元、中元元和、下元元祐也。”据陈衍说,这一看法得到了沈曾植的赞同:“君谓三元,皆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、殖民政策、开埠头本领^①。”可是,沈曾植1918年写《与金甸丞太守论诗书》,看法就不尽相同:“吾尝谓诗有元祐、元和、元嘉三关,公于前二关均已通过,但着意通第三关,自有解脱月在^②。”而且,“尝谓”云云,也说明并非突然发明。

沈曾植和陈衍关于“三元”的异同,有着并不简单的思路。陈氏之说,所选择的学诗途径是从苏、黄及江西诗派入手,经过韩愈,最后到达杜甫,或者反过来说,是诗歌由杜甫开始导引的必然之路,为宋诗和后来的宗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。而沈曾植的诗学却并非宋调所能限制,陈衍《石遗室诗话》卷十一就指出他“以平原、康乐之骨采,写景纯、彭泽之思致”,和六朝深有渊源。考虑到沈曾植和王闿运的关系,则沈氏增加“元嘉”一关,就并不是无缘无故的,而陈衍之批评王闿运就不仅是领袖地位之争,也含有正本清源的意思。清代宋诗运动的先驱翁方纲曾提出:“考订训诂之事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”^③,因而应该“由性情而合之学问”^④,可在实际操作上,更为重视的仍然是知识和义理,所以受到袁枚的强烈批评^⑤。翁氏的观点,发展到宋诗派,已经登峰造极。如宋诗派领袖程春泽就曾指出:“《诗》、《骚》之原,首性情,次学问。《诗》无学问则《雅》、《颂》缺,《骚》无学问则《大招》废。世有俊才洒洒,倾倒一时,一遇鸿举巨制则瞢然无所措,无它,学问浅也。学问浅则性情焉得厚?^⑥”已经把学问强调到了不适当的程度,造成宋诗派的某些作品成为书本的展览,失去了诗歌本来的

特色。同光体兴,显然对这一教训有所认识。所以陈衍说:“不先为诗人之诗,而径为学人之诗,往往终于学人,不到真诗人境界。盖学问有余,性情不足也。”^⑥”尽管只是把性情当作诗的起点,但认为应该学问性情相济,仍然显得圆通。这和王闾运有什么关系呢?中国的诗歌传统,至六朝确立了“诗缘情”的标准,成为做诗的一个重要取向。王闾运推崇六朝诗,把性情提到应有的高度,正可以用来药治宋诗派过重学问之弊,有见之士如沈曾植等有可能正是从这里得到的资源。因此,尽管陈衍本人在性情与学问的思考上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湖湘之学,但他为了自己“广大教化主”的地位,仍然要极力加以反对。当然,沈曾植和王闾运的诗学观点未必完全相同,其《与金甸丞太守论诗书》就曾说过这样一件事:“记癸丑年同人修襍赋诗,鄙出五古一章,樊山五体投地,谓:‘此真晋宋诗,湘绮毕生,何尝梦见?’虽谬赞,却愜鄙怀。其实止用皇疏川上章议,引而申之。湘绮虽语妙天下,湘中《选》体,镂采错金,玄理固无人会得些子也。”但渊源流别,终不能视而不见^⑦。

汪辟疆论诗,对王闾运评价甚高,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推其为“诗坛旧头领”,拟为托塔天王晁盖。“学赡才高,一时无偶”,“门生遍湘蜀”。这和当时不少人的看法相同。如徐世昌《晚晴簃诗汇》:“自曾文正公提倡文学,海内靡然从风。经学尊乾嘉,诗派法西江,文章宗桐城。壬戌后起,别树一帜。解经则主简括大义,不务繁征博引;文尚建安典午,意在骈散未分;诗拟六代,兼涉初唐。湘蜀之士多宗之,壁垒为之一变。”瞿铎庵《钝庐所闻录》:“王壬戌闾运以经学文章名坛站者,历咸、同、光、宣至民国,享名之久,又值变局,盖古今所稀逢^⑧。”汪辟疆不满陈衍对王闾运的态度,尤其不满其借批评王闾运

而高自标置的用心,所以特别强调王闳运的不可忽视的地位。从王闳运入手建立诗学体系,这是汪、陈之所同,至于其目的,那就截然相反了。

陈衍成名较晚,其《与梁众异黄秋岳书》云:“衍治诗四十年,其始第以纪游览,志聚散,兄弟倡和,友朋不过二三人,皆寂寞无闻者。二十余岁出游四方,稍识一时贤俊,然赠答至寡^②。”他与同时名贤结交,是在1898年入张之洞幕府之后,当时诗坛俊彦甚多,也还显不到他。他后来得大名,被时人尊为“泰山北斗”,是由于撰《石遗室诗话》和编《近代诗钞》,加上同时同光诗人或死或退,而他又老寿,因此就成为诗坛巨擘了。

对陈衍诗歌的评价,高者拟之为同光体之魁郑孝胥、陈三立^③,低者则贬之为“固不逮散原、海藏、听水,更且出苍虬、刚父、节庵诸人下,弟子爰居阁、花随人圣庵,亦有出蓝之誉”,“在同时诸家中,当可列二流之末”^④。汪辟疆作《点将录》,对陈衍的诗歌创作评价一般,而推崇其诗论,方之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:“石遗老人初治经,旁及许洵长,多可听。中年以诗名,顾非甚工。至说诗,则居然广大教主矣。朱武在山寨中,虽无十分本事,却精通阵法,广有谋略。”可是,在老辈的心目中,能说诗终不如能作诗重要,汪评不无微辞。这其实也有传承。被《点将录》拟为天机星智多星吴用的陈宝琛也对陈衍表示过不满,他曾对汪辟疆说:“余诗随所止寓兴,不可更易。石遗辑师友诗及《近代诗钞》,余诗皆从木庵处移录。见诗题不具者,以意为之,颇乖余旨。”暗示陈衍其实也并不总是内行^⑤。汪辟疆和陈宝琛深有渊源,这些看法应非无缘无故。

这样,我们就可以得知,汪辟疆论近代诗在一些方面有着

和陈衍不同的取向。作为“广大教主”，陈衍已经确立了其近代诗论的权威地位，汪辟疆的批判，乃在于消解这个地位，从而一定程度上重新建构了近代诗的评价系统。

四、清末民初的学术文化背景

汪辟疆出生在一个具有丰厚文化传统的家庭，和晚近学坛渊源很深，和一时名流多有交往，讨论他的学术，必须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看。

汪辟疆学诗从元祐入，深得江西诗法，熟知宋诗流变家数，但论诗却不为宋人所囿，甚至认为近代诗学成就即宋人亦有所不及，这种文学发展观固然来自他本人的功力和眼光，但也不可忽视当时的文化背景。

陈衍《石遗室诗话》卷一指出：“道咸以来，何子贞(绍基)、祁春圃(寓藻)、魏默深(源)、曾涤生(国藩)、欧阳骛东(轸)、郑子尹(珍)、莫子偲(友芝)诸老喜言宋诗。”同光以后，沈曾植、陈三立、郑孝胥等人继之而起，包括陈衍本人在内，宗宋之风甚盛。施山在《望云楼诗话》中曾言及曾国藩的作用：“今曾相国酷嗜黄诗，诗亦类黄，风尚一变。大江南北，黄诗价重，部值千金。”沈曾植和陈衍更提出“三元说”，指出宋诗渊源有自，是诗史的合理发展。准此，陈衍认为：“夫学问之事惟在至与不至耳。至则有变化之能事焉，不至则声音笑貌之为尔耳。唐人之声貌至不一矣。开、天、元和，一其人一其声貌，所以为开、天、元和也。开、天之少陵、摩诘，元和之香山、昌黎，又往往一人不一声貌。故开、天、元和者，世所分唐宋诗之枢干